

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理论学习2014年度论文集

责任编辑 顾晨溪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理论学习 2014 年度论文集

本书编委会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海财经大学理论学习 2014 年度论文集/本书编委会.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642-2120-1/F·2120

I. ①全… II. ①本…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文集 IV. ①D6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0708 号

责任编辑 顾晨溪

封面设计 张克瑶

QUANMIAN SHENHUA GAIGE TUIJIN ZHILI TIXI HE ZHILI NENGLI XIANDAIHUA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理论学习 2014 年度论文集

本书编委会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mailto: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787mm×1092mm 1/16 25.25 印张 567 千字

定价:69.00 元

## 本书编委会

主任

丛树海 刘永章 陈宏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国强	朱鸣雄	何玉长	应望江
张雄	郑少华	范宝舟	俞卫
柳永明	胡怡建	赵晓雷	徐龙炳
章忠民	章益国	鲁品越	靳玉英

# 前 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决定》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战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及改革的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都进行了揭示。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然而,新的历史使命、新的经济问题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和新的经济政策。我校是以财经研究见长的大学,学校致力于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用先进理论、思想和文化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发挥思想库、人才库、信息库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校党委及时提出,要结合我校优势和特色,加强科学研究,以科研服务社会。

为及时总结我校最新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识,我校在前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会征文的基础上,扩大征稿范围,创新编辑流程,出版《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海财经大学理论学习 2014 年度论文集》。该论文集以学术主持的形式紧紧围绕《决定》的十六部分组织稿件并发表评论。论文集的作者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回顾改革,前瞻国事,对改革的意义、如何准确把握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如何克服当前面临的阻碍、如何有效推进当前的改革等问题进行深层的思考,对未来改革道路进行展望、分析、建议和设计,为国家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转型提供了高水平的智力支持。

我校自 1995 年以来已先后出版了 15 本师生员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论文集,今年是第 16 本。本书力求全面反映我校理论研究的水平,由于篇幅所限,还有一部分重要的文章没有收录,对于这部分论文的作者表示感谢和歉意。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促进我校理论学习的深入开展,有助于把我校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落到实处。

编委会

2014 年 12 月

# 目 录

1	前言	
	<b>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主持人:张雄)</b>	
4	“全面深化改革”寓意的历史哲学解读	张 雄
13	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坚定道路自信	戴国强
	<b>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主持人:田国强)</b>	
20	富民才能强国的经济学内在逻辑	田国强 夏纪军 陈旭东
	<b>三、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主持人:靳玉英 柳永明)</b>	
37	中国银行业净息差与非利息收入的关系研究	刘莉亚 李明辉 孙 莎 杨金强
54	政治关联维度、地区市场化程度与并购 ——来自上市民营企业的经验数据	江若尘 莫材友 徐 庆
67	金融冲击和中国经济波动	王国静 田国强
85	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市场压力吸收方式的比较研究	靳玉英 周 兵 张志栋
	<b>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主持人:何玉长)</b>	
112	理清市场与政府的功能边界	何玉长
	<b>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主持人:胡怡建)</b>	
122	全面推进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定	朱为群

128	现代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其基本思路	曾军平
136	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	胡怡建 徐曙娜
<b>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主持人:徐龙炳)</b>		
149	我国农村消费与收入的结构效应:理论机制分析及其实证检验	周 建 艾春荣 王丹枫 唐 莹
163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效果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1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杨翠迎 冯广刚
<b>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持人:赵晓雷)</b>		
174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司法试验	郑少华
181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平台经济”城市	晁钢令 王 涛
194	自贸区金融开放与改革的理论构思 ——从要素流动速度不对称视角分析	丁剑平 赵晓菊
204	外资负面清单管理的国际镜鉴:上海自贸试验区例证	孙元欣
<b>八、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主持人:鲁品越)</b>		
220	对立,还是联合?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特征	张朋光
<b>九、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主持人:郑少华)</b>		
232	从“群众参与”到“公民参与”:司法公共性的未来	陈洪杰
249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法治精神解读	张淑芳
<b>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主持人:章忠民)</b>		
262	财政透明与政治控制	王效洁
<b>十一、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主持人:范宝舟)</b>		
272	从经济空间到文化空间的生产 ——兼论“文化—科技—经济”统一体的发展	鲁品越

**十二、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主持人:俞卫)**

- 280 老年照料的相对报酬:对“护工荒”的一个解释 余央央 封 进
- 292 养老金“双轨制”改革:求同还是存异? 张 熠 刘金东
- 311 政府卫生支出对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 李 华 俞 卫
- 328 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樊丽明 解 垚

**十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主持人:应望江)**

- 346 网络传播秩序、谣言与治理 胡 凌
- 352 我国自贸区社会组织建设的制度创新初探 王全兴 王凤岩

**十四、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主持人:郑少华)**

- 364 经济哲学视域中的生态危机发生机制透析  
——“美丽中国”的观念改造方案 卜祥记 何亚娟

**十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主持人:赵晓雷)**

- 374 国防工业发展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研究 纪建强 陈晓和

**十六、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主持人:朱鸣雄)**

- 384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范宝舟

#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和指导思想



## 主持人导语：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长足进步,系统地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寓意及部署,清晰地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逻辑和实践模式,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总要求。可以说,《决定》既是一个寓意精深的政治宣言,更是一个求真务实的行动纲领,她显现了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的智慧。

张雄教授的《“全面深化改革”寓意的历史哲学解读》文章,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乃是一种对失去历史必然性的、陈旧的人类实践活动方式作出自觉的精神反思与整合的历史认知形式。它内含着否定、批判、怀疑以及变革的精神,并以“加速历史转变进程”为主题,积极地表达了历史主体主动参与社会变革的意志和能力。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本质在于: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历史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二是对《决定》精神的准确把握,首先应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坐标中,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空间与深刻内涵;它有助于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有助于提供赶超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契机和条件。三是《决定》指出,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决定》的意义很多,但最特殊的意义是资本的解放问题。

戴国强教授的《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坚定道路自信》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一个顺应中国国情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文件,体现了我们党坚定的改革勇气。《决定》深刻揭示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展理论创新,为我们的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张 雄

# “全面深化改革”寓意的历史哲学解读<sup>①</sup>

张 雄<sup>②</sup>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今日社会主义的中国,闪烁着无限的生命活力,绽放出无限绚丽多彩的智慧花朵,它使得西方人开始认真琢磨三件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化文本,已成为探索和回答上述问题的重要依据。它使得中国人开始认真琢磨三件事:当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中被证明了有制度优势的时候,我们下一步该干什么?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取得巨大成功以后,我们将如何与时俱进争取获得更大的成就?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自身的特殊性而展示出丰富而又深刻的普遍性原理时,我们如何进一步去践行它和发展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为国内外和党内外作了最好的回答。千头万绪的道理,其中一条最重要: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自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惟有如此,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 一、惟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我们党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积极应对 21 世纪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与事件的挑战、智慧地驾驭理性化社会转型的一部杰出的政治哲学科学范本和行动纲领。《决定》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适时地分析与洞察国际社会发展最复杂的当下形势与环境,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事件、互联网引发的人类生存方式的重大变化以及第三次产业革命等规律趋势,从知变、应变和策变的战略构思中深刻总结和形成了闪现我们党执政睿智的行动纲领。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具有“人民性”的标志。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曾深刻地反思了如此重要的一个命题:怎样看待“历史必然性”?长期以来,在对待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我们存在着物性化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具体表现在:把发展理解为被神圣化了的“历史必然性”的自发生长。误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进化的优质产品可以自然而然地像自然界的植物一样,静悄悄地实现自身历

<sup>①</sup> 本文发表于 2014 年第 3 期《思想理论教育》。

<sup>②</sup>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史的演化创新,历史不作任何飞跃。这里有着把高级形态的历史必然性上升为一种值得崇拜和心理上可依赖的信仰对象方面的原因,也有着把历史必然性看成是与偶然性无缘的错觉。由于社会主义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高级社会形态,因此,它的强盛也是必然的,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早已袖珍地包含在预先设定的模式中。以后的发展不过是这一模式在实践中的具体展开。这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严重误读。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分析历史偶然性——揭示历史必然性——说明历史偶然性”才是他的理论逻辑的真正甬道。唯物史观和机械决定论都注重历史必然性的作用,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不是用历史必然性来消解历史偶然性,不用必然性的结论去否定偶然性的存在,而是给予历史偶然性的历史发展的寓意和地位。在他看来,历史必然性总是要通过历史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他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历史偶然性作用的根据在于它是现实人的实践活动所表现出的种种具有活力的态势或事件,是主体在特定范围内由自身内在本质的联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运作的产物。因而,历史偶然性又能成为主体实践活动选择的质料,在主体的观念中往往表现为发展的机遇或时机,选择或放弃某种历史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体能否获得社会系统再发展的初始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宾格勒强调:“时机的把握,可以决定整个民族的前途,把握得当,其民族便能主宰其他民族的命运,把握不当,自身的命运,便成为其他民族的目标。”在1978年以前,我们一谈到发展,要么与本民族历史上的生活状况相比,如“文化大革命”大搞“忆苦思甜”活动,试图使人们在过去的落后中感受到今日发展的力量;要么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相比,我们自以为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榜样。这种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客观上带来了极度膨胀的民族祝福意识、极度贫弱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在1987年6月12日《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这篇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理解为“历史必然性”的自发作用,其错误根源还在于我们误解了马克思的另一命题: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决于“规律”的作用,而人的功力是可有可无的。他们把“自然历史”理解为不受历史主体实践活动左右的一种社会物质化的演进过程。马克思的原意果真如此吗?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提到这个命题是有着特定的语义范围的。他说,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经济活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意指经济形态不可跨越的历史必然性。“自然”的含义,不是指无人介入或与人无关,而是强调经济形态在历史过程中有一种前后相继、不可割断的“链条关系”。它不是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换的事实。

惟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才能找出发

展的差距和落后之处,才能引发改革开放的紧迫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拟定。20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已越来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经济全球化决定了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驱动;世界历史进程代表了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一种趋势;把握了它,就会消除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与融合,使得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义。全面深化改革乃是一种对失去历史必然性的、陈旧的人类实践活动方式作出自觉的精神反思与整合的历史认知形式。它内含着否定、批判、怀疑以及实践变革的精神,并以“加速历史转变进程”为主题,积极地表达了历史主体主动参与社会变革的意志和能力。全面深化改革,其哲学本质在于: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历史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当社会生产力提出质向发展的新要求时,历史的实践主体按照确认的“发展逻辑”,对原型社会的结构、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以实现社会演化的创新。一个民族或国家有无进步,衡量的参照系不同,所得出的答案也不一样。如果以本民族历史的发展作为惟一的参照系,那么,它时时会感到满足与安全,像幸运儿一样,成天宁静地注视着似乎有把握的当前和未来,历史进步的神经永远不会被触动。如果以世界历史进程作为参照系,那么,它时时会感到发展的紧迫感与机遇感,像天天被翻动的日历一样,总感到时间上的过去与未来的紧张,而历史的进步却姗姗而来。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呢?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直接关系到每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大问题。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自觉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它本质地反映了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社会主体能动地架构社会变革,自觉推进社会进步的特征。所谓“自觉”,即适时地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客观审慎的评估;对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认识;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心与能力的持有;用历史机遇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积极引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知识和装备;主动实行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与创新等等,使自身发展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准确把握,首先应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坐标中,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空间与深刻内涵:它有助于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中心主义,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有助于提供赶超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契机和条件。

## 二、三十五年的执政智慧:从不得不改革,到自觉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同志在解读《决定》时指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从邓小平同志的“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忧患意识,到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鲜明地展示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发展动力的认知有了科学的重大提升,至少在八个方面体现了认识的深化: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再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的关系、“危

机”与自觉改革的关系、历史偶然性与社会变革机遇的关系、实践意识与实践变革的原理、生产力的质向飞跃与人的自由自主活动的关系、社会主义发展与执政党的自我忧患、自觉转型的关系等等。

实际上,社会主义要不要适时地推进“二次革命”(改革)?我们党对此有过沉痛的教训。十年“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的沉重的灾难。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就引发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社会主义有没有危机?改革开放前,我们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把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否认社会主义自身发展存在着危机现象。把危机看成是绝对的坏,无视危机与发展、危机与演化创新的关系。从而丧失了准确判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历史进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的能力。结果,别国在自觉投入世界范围的理性化社会转型改革实践,而我们却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

关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应当何时进行变革,我们往往记住了马克思的这段话: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不少人热心于把这段危机机制的经典表述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联系起来,应当说,这是对的。可是,马克思对社会发展与危机的关系的揭示并不是仅仅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还应当包括任何社会形态。第一,这段经典原理从前至后,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马克思的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我们不能根据情感偏好来判定社会危机问题。不能说,资本主义是丑恶的社会,因而它天天危机;社会主义是美好的社会,因而它岁岁平安。二是一种社会形态或一种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的衰亡,以及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或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的出现,乃是任何一个社会演化创新所不可避免的问题。三是社会更新与历史演化创新是人类始终必须接受的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脱离人类历史一般进程的特殊社会,它既然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就应当遵循矛盾发展的客观机制,它应当有基本适应的时期,也有生产关系成为桎梏的时期;有社会革命(特指由生产力飞跃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社会体制转换的革命,即改革)到来时期;上层建筑变革(不是政权的变易,而是政治体制改革)时期。“变革”不一定特指推翻政权,它也含有变化、改革、改良的意思。如习近平同志在解读《报告》时所指出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应当说,从社会主义迈向

共产主义,其间发展必定要有大量的如此阶段性的全面系统改革,这种改革首先导因于生产力的发展诉求,既然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内容,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又是相对稳定的,那么,生产关系成为“麻烦”也势所必然。没有“麻烦”,也就证明生产力没有质向飞跃,社会主义就不会有阶段性质变。“麻烦”并不可怕,它既是生产力被严重束缚的标志,又是社会进入新的演化创新阶段的信号。可怕的是,我们面临着“麻烦”却回避它,不把它视为发展的机遇,而是看成局部范围的不适应,可以通过渐进、缓慢的调整来改变它,这样,社会主义只能越来越失去生产力发展的活力,制度的优越性就很难体现出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战略部署,正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让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更加协调一致,更加充满活力而创设的。

改革开放前,我们往往把“危机”拱手让予西方,西方则把这种“危机”变成自觉转型、自觉变革的行动,其结果是,它们的生产力更加发展了。而我们的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实际上,在生产力与旧体制、旧的社会结构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的情况下,我们要敢于承认矛盾,积极做好转化矛盾的工作,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变束缚的生产力为解放的生产力,社会就必然发展,历史就必然前进。危机既可以通向衰微,也可以步入发展,关键取决于历史主体对危机的认识和自觉操作的态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充分闪现自觉改革的能动性方面有着如此特征:一是强化问题意识和诊断意识,把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框架,拟定在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上。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三是提倡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四是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习近平同志在解读《决定》时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我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等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改革开放新时期中蓬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理所应当要具有现实的批判力和社会诊断精神,直面改革发展实践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三十年前作为改革的理论先声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仅具有一种历史的界碑意义,更具有恒久的实践意义。任何时候,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需要立足于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去解决实际问题。改革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就是为了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经济和科学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问题。因此,改革就必然是要在问题堆中杀出一条“血路”才有可能前进的。当下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已进入到一